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刘丹凌 著

# 民生话语与权力博弈

## ——住房改革报道研究

解析住房体制改革报道的话语之谜  
透视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博弈关系  
管窥传媒域与社会权力的深切勾连  
探索民生新闻话语实践的良性机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

刘丹凌 著

# 民生话语与权力博弈

## ——住房改革报道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生话语与权力博弈——住房改革报道研究/刘丹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ISBN 978-7-309-10332-8

I. 民… II. 刘… III. 住房制度改革-新闻报道-研究-中国 IV. ①G219.2②F299.2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7608号

民生话语与权力博弈——住房改革报道研究  
刘丹凌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04 千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332-8/G·1266  
定价:32.5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获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0BXW017）  
及201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编号：SWU1409114）的支持，特此鸣谢！

## 丛 书 序

中国改革开放激荡的 35 年,也是中国传媒业大发展的 35 年。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提升,这些既可以看做中国传媒业砥砺前行的大背景,同时也能体现出媒介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紧密勾连。

全球化的浪潮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改革与传媒业的发展也不再是关起门来自己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与全球频调同步。世界性的话题会有中国版本,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有世界因素渗入。通过媒介,个体得以同世界对话。而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中介,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前所未有地重要。毫不夸张地讲,在现今这个信息社会,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由各种媒介搭建起来的信息空间,很少会被人意识到其存在。

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的覆盖面如此广阔,作用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它?而认识的下一步则是要问,对于媒介我们有着怎样的诉求?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无法对话,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在过程中不断明确媒介化社会中“人”的主体地位。只有从“人”的本真出发,去思考,去研究,去给出设想和规划,并付诸实践,才可以不为霸权操控,不受资本蛊惑,不被技术奴役。

本系列精选了当前新闻传播学科中最新、最具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包括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历时四年覆盖全国的受众调查报告;针对风险社会六大热点问题定向进行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分配热点报道的研究;以传播为核心理论视角重构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耗费了作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思路深邃开阔,论证严谨扎实,富有想象力和人文关怀。

我们希望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用社会调查实证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摸清在中国多种媒介并存发展的现实语境下,“政府—市场—媒介—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以多点切入专题关注案例分析的形式梳理出社会核心问题的媒介呈现,以此来反思传媒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变“结构中的传播”为“经由传播而组织”,真正从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事物的建构过程以充实新闻传播学的核心理论。

诚然我们的愿景美好,但实践起来并非易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在此耗费心力心血。一个人、一本书的作用有限,但我们更愿意用今天的辛苦换取整个社会对“媒介如何发展以促进国家振兴与社会和谐”的关注反思,我们相信路虽遥远,但只要开始思考,就已经在路上。

记得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自我之歌》中将自我的意识扩大成为民族意识和宇宙意识,并将两者合二为一,于是心灵自由,国家兴旺。中国梦,梦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之路弥坚,更需要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与诸位共勉。

“我走在永恒旅途上,  
我的标志是一件雨衣、一双好鞋,  
和丛树林中砍来的一根手杖。  
我的朋友谁也不在我的椅子上休憩,  
我没有椅子,没有教堂,没有哲学,  
我不把任何人领到餐桌边、图书馆或交易所去。  
我只是领着你们,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到一座小山丘上,  
我左手挽住你,  
右手指向各个大陆的风景,和那条大道。”

李良荣

2013年9月于复旦

绪论 / 1

第一章 “缺失的民生”——住房体制改革的媒介镜像 / 11

第一节 住房改革的民生价值 / 12

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简史 / 12

二、住房体制改革的民生价值 / 21

第二节 “民生内容”：缺位 / 25

一、住房体制改革报道的“绝对信息量” / 25

二、住房体制改革报道的“相对信息量” / 28

第三节 “民生视角”：次级化 / 36

一、主流价值视域中的政治话语：“编码”模式 / 38

二、消费主义景观中的经济话语：“马赛克”模式 / 43

三、边缘化与殖民化的民生话语：“表达”模式 / 51

第四节 “民本意识”：虚化 / 58

一、住房体制改革报道中的主导意识 / 60

二、住房体制改革报道中被“虚化”的民本意识 / 63

第二章 畸形的建构：幻象、身份与价值 / 66

第一节 “完美家园”——欲望-想象的刺激与生成 / 69

一、从“福利”到“投资”：规范情境中的意义生成 / 70

二、社会认同：身份情境中的意义生成 / 72

三、完美家园：关系情境中的意义生成 / 73

第二节 “房奴”：媒介文化中的别样身份 / 76

一、“房奴”称谓的起源与传播 / 76

二、媒介镜像中的别样身份 / 81

第三节 “重庆最牛钉子户”：媒介话语事件 / 87

一、“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始末 / 88

二、谁塑造了“钉子户”——一桩典型的媒介话语事件 / 91

第三章 异化的话语策略：悬置民生 / 104

第一节 房地产报道：增大的现实 / 106

一、重心偏移：以“房地产”为中心的住房体制改革报道 / 107

二、房产专刊——一种典型的经济话语构织 / 112

三、话语的“力量”：买房动员 / 118

第二节 互文性：话语联盟与意义互渗 / 126

一、新闻与广告：华丽的“互文性景观” / 129

二、互文性语境：以电视剧《蜗居》为例 / 138

第三节 客体化、他化与浅表化 / 145

一、客体化报道——悲壮的“蚁族” / 145

二、批评报道的他化 / 154

三、浅表化报道——以“温州炒房团”报道为例 / 162

第四章 新闻生产：话语、权力与社会实践 / 166

第一节 特殊的话语生产：权力博弈中的行进 / 167

一、党和政府：信息公开与价值宣传 / 168

二、房地产商：利益最大化 / 173

三、民众：生存与发展 / 178

四、媒介：权力博弈中的行进 / 181



第二节 新闻专业主义的“偏向” / 182

一、新闻机构与制度性羁绊 / 184

二、从业者偏见与选择性框架 / 191

三、新闻价值与轰动性 / 201

四、新闻伦理与责任旁落 / 205

第五章 从房改报道管窥民生新闻话语实践的路径 / 208

第一节 公共领域与公共利益 / 210

第二节 人文关怀——传媒者的理想型 / 223

第三节 参与式民主：公民“四权”视野下的民生新闻路径 / 232

参考文献 / 239

后记 / 245

## 绪 论

---

住房体制改革<sup>①</sup>报道是中国传媒实践当中一个典型而意义深远的“样本”。住房体制改革本身的民生价值以及房改报道对现实生活的建构和干预功能将这个问题推入我们的研究视域。作为一个特殊的微观视角,房改报道拨开了我们管窥更为广阔的传媒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之窗口。

学界已经注意到房改报道的重要价值,很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和层面进行研究,包括房改报道的业务探讨(尤其是房地产报道制作的策略和技巧),典型房改事件报道的个案分析,房产报道媒体立场、媒体责任及社会影响研究等,涉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媒体的责任等重要议题,并就如何完善、优化房改报道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但就总体而言,房改报道的研究仍停留在浅表化的微观层面,缺乏深入的系统研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及众多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房改在媒体中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观?这些景观是如何建构的?它们的建构又对受众及改革事件本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报道的缺陷在哪里?如何引导媒体的行为?尤其是作为一种民生新闻类型,房改报道带来怎样的启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量化研究和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之局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将房改报道作为动态话语

---

<sup>①</sup> 本书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使用“住房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改革”、“房改”,特指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城镇居民住房政策方面的调整和转变。

实践过程加以审视,不仅考察它呈现了什么、如何呈现,而且关注它的生产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博弈关系,旨在探索一种良性的民生新闻话语生产机制。

根据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 Van Dijk)的梳理,早期的新闻研究主要有四种取向:第一种是从奇闻轶事到社会学解释的“新闻见证者叙事”取向;第二种是从宏观社会学到微观社会学的取向;第三种是从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分析到系统的内容分析的取向;第四种是西欧其他研究取向。他认为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于对媒体中新闻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并主张采用一种新的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即话语分析,对新闻话语和新闻流程进行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旨在探讨新闻结构与新闻制作、新闻接受及阐释之间的关系及系统<sup>①</sup>。这种理论视域的逻辑前提是:新闻是话语,话语是一种运动的实践过程,因此新闻报道也是一种话语实践。新闻话语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参与了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试图影响着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特别是那种有关权力、被剥夺权利、统治、偏见和/或歧视的关系”<sup>②</sup>。新闻报道作为话语实践,它所呈现的“现实”并非纯粹给定的“客观现实”,相反,它所提供的是一个经由新闻话语建构起来的“拟态现实”。话语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及媒介,而且是具有强大构建作用的实践过程。话语这种构建作用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有典型的描述,他精彩地分析了话语如何构建知识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关系。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吸收了福柯的思想并加以延展,他指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它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

<sup>①</sup> 参见〔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sup>②</sup> 〔英〕鲍勃·富兰克林等编撰:《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页。

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sup>①</sup>话语的这一建构功能打破了人们关于现实存在的自然主义态度,社会实在、社会主体,包括利益、行为等都可以借助话语加以建构。米格尔·卡夫雷拉(Miguel Cabrera)在《后社会史初探》中如是阐释:“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客体从未作为存在性的东西被给予我们。它们始终是在话语构型之中被给予我们的。因为语言做的并不是为客体命名,也不是揭示客体,而是通过部署某种特定的分类体系,真真切切地创造出客体,实实在在地将客体本身带入存在。人们正是通过应用这一体系,将周遭的事实转换成蕴涵意义的情节,将单纯的感觉转换成相关的意义。”<sup>②</sup>

要准确界定话语并不容易。在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人编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话语被描述为:“一个如今常以不同目的而被广泛用于许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就其最不易引起争议的意义而言,这个术语用在语言学中以指称比句子更重要的动词性言说(verbal utterance)。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某个言说者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言说者的交替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中之话语的语言规则与社会习俗。”<sup>③</sup>在费斯克等人看来,话语源于语言但不同于语言,因为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是抽象的。所以,他们指出:“‘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

---

①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段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3页。

② [西]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美]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③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的‘语言’概念。与‘语言’不同，话语本身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属性。所以，它更易保持话语作为一种行为的意义，而名词性的‘语言’往往好像仅仅指涉一种事物。在其确定的用法中，话语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sup>①</sup>

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对话语作如下描述。其一，话语不同于作为规范或规则的抽象语言概念，它通常被视为语言中大于句子的单位，是由相互关联的句子组合而成，更大的话语结构甚至可以涵盖一个文本。话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类似于福柯所谓的“陈述的整体”，是一套陈述或“说辞”。其二，话语是具体的，是一定语境下的语言活动，是“语言的使用”，并且是与“现实世界”有关联的语言活动。这表明它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语言活动。或者说，话语指的是发生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书写或言谈。我们把话语视为一套相关联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在现实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说的：“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含义。首先，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产生作用。”<sup>②</sup>费尔克拉夫所说的话语的“行为”观源于福柯的“话语实践”。在福柯看来，话语就是“话语实践”，不同话语具有不同的实践功能，形成不同的知识。其三，话语具有建构性。话语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和反映，还建构着社会现实。“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条件，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

<sup>①</sup> [美]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4—85 页。

<sup>②</sup>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9 页。

义和所有的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另一方面,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这是福柯关于客体、主体和概念的话语结构讨论的意义。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它本身的规范和习俗及其背后的关系、身份和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sup>①</sup>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的建构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身份”的建构,话语构建社会主体以及各种类型的“自我”;二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利益的建构;三是观念体系的构建,包括知识和信仰体系的构建。其四,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含义。话语的构建作用常常是借助意识形态来完成的。意识形态帮助我们建立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形成我们最基本的价值体系,参与主体的建构。话语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含义,最基本的就是权力关系。对此,费尔克拉夫吸收了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福柯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我将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将话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的权力观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斗争的权力关系演化观中。”<sup>②</sup>简单说来,话语包含了权力的争夺,以及权力的生产、再生产,这构成了话语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意义。

米格尔·卡夫雷拉指出:“新文化史学者的结论是,关于社会的理论要想说明人类社会的运作与变迁,就必须基于物质属性与符号特性之间互动、实在压力与文化生成能力之间的互动,以及外在强制与个体主动性之间的互动。”<sup>③</sup>在这种理论框架中,结构与行动之间经由了符号中介。文化不是附生的,不是社会条件的某种功能衍生,不是观念的

---

①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0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西] 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美〕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简单接受端,而是“实践”——“文化成为实践,也就是说,成为一种动态实例,为独特的实践提供生成性原则,其结果,成为社会关系的共同生产因素。”<sup>①</sup>事实上,人们总是根据既定的文化来理解实在界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文化是社会位置和个体决策之间的中介,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套阐释和理解现实生活的法则,并协助作为个体的人们据此进行决策、并展开行动。这种思想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表征》中的论述不谋而合:“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sup>②</sup>

新闻报道作为媒介文化的独特景观也为特定的生活实践提供了生成性原则,参与到具体意义的生产和交换,以及相应社会关系的建构、重构与改善过程当中,正是通过新闻,广大的公众才得以知晓新近发生的事实,了解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并为之影响;也正是这些新闻深深影响着对我们生活做出重要决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们<sup>③</sup>。因此,新闻不是封闭的文本,不是对给定的“实在”绝对客观、真实的表现和再现,而是在特定的新闻语言和新闻符号系统规约下完成的一种话语活动,它是与具体文化语境、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和构建的媒介话语实践。

我们认为,房改报道是一种作为民生话语实践的新闻形态。它关涉以住房体制改革为内容的新闻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阅读和理解)过程,参与到政府、企业、公众关系以及各种利益和消费主体的建构当中。房改报道作为一种民生新闻话语实践始于作为社会活动的新闻

---

① [西] 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美〕 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② [英]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荷〕托伊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采集和制作,通常是以职业身份出场的记者、编辑在专业机构的组织和规范下,收集并描述与住房体制变迁相关联的新鲜事实、动向,比如政策变化、拆迁、房价波动等,借助媒介语言代表和表征与之相关的一组概念、观念、情感、态度,比如公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房供应多元化、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管理市场化等,以完成相应意义的建构。可以说,它是对某些具有特定内容属性的新闻事实的特殊呈现、传播方式,并关联受众的接受和解释过程。它与特定的语境和媒体话语变迁相适应。这种话语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闻文本是社会地、历史的建构,是各种文体规则、叙事元素、权力建制等资源的配置和生产,从其复杂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我们发现,其包含的信息和意义并非是透明的、一目了然的,这种传播过程不是信息量或意义的同质流动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意义的建构、散布、解释、协商和斗争过程<sup>①</sup>。由此可见,住房改革报道不是一种意义的封闭结构,不是归于静止的终结式文本,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如果将其仅仅视为静态的文本,进行单纯的语言分析和文本分析,把分析和讨论的重点施于它所呈现的“客观真实”,将禁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有效性。换言之,在对住房改革报道的具体研究中,抛开话语实践的向度,我们将无法了解关于住房体制改革的新闻是如何生产的,它又在形成、确认和改变我们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及态度上发挥怎样的功能,进而从微观层面的房改报道管窥中观层面的民生新闻实践,以及宏观层面的公共领域、公众利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将住房改革报道作为民生话语实践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取向。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Z·哈里斯(Z. Harris)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首次提出并使用的。通常认为,话语分析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

---

<sup>①</sup> 参见胡春杨:《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13 页。



等。迪克指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这种描写有两个主要的视角，我们简单地称之为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sup>①</sup>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理论把迪克的两个视角拓展为三个向度（抑或说三个层次）：文本的向度、话语实践的向度以及社会实践的向度。

话语不等同于文本，文本仅仅是话语的物质化表现形式。阐释话语的文本向度为我们展示了不同话语元素的运用和咬合，为我们提供了追索意义和权力关系的轨迹。在费尔克拉夫看来，作为文本的话语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话语分析首先要研究一些独特的词汇，分析它们的形成、变化，这样可以阐释现实问题，揭示出现实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语法考察的是语句，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意思，它一般被人们理解为观念，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包含一个观念，实际上，任何文本分析都离不开对文本语句的研究；连贯性关注句子与句子的组合如何构成一个文本，也就是多个观念的组合，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意义；文本结构主要考察一个完整文本的构架，相当于文本“建筑学”。这四个方面是逐层深入的，从词语、句子、句子组合到一个真实呈现的文本，它们构成了整个话语分析的基础。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文本本身的意义。但是，“文本只说明了话语占有的一个具体空间，而无法说明文本传输的意义在生产者与接收者那里产生的差异性 with 多样性，文本只有通过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与它所利用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和它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本质相联系才具有意义。”<sup>②</sup>

因此，话语分析的第二个向度就是话语实践，它涉及文本的生产、

---

① [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胡春杨：《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